

回首“文革”（中）

张化，苏采青主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责任编辑:萧淮苏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回首“文革”张化,苏采青主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9.12

ISBN 7 - 80136 - 337 - X

.回... . 张... 苏...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 研
究 - 文集 D65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21685 号

回 首 “ 文 革 ”(共四卷)

张 化 苏采青 主 编

郑 谦 王寅城 副主编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通讯处:北京 9723 信箱 邮编:100029

地址:北京朝阳区安外小关东里 10 号院(北门 10 号楼)

电话:(010)64946059 传真:(010)64968014

经 销:新 华 书 店

印 刷:北京书林印刷厂

850 × 1168 毫米 32 开 48 印张 940 千字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4 月第 3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80136 - 337 - X K·297

定 价:108.00 元(共四卷)

目 录

上

历史经验是宝贵的财富(代序)	胡 绳(1)
中国为什么犯二十年的“左”倾错误	胡乔木(6)
介绍和答问——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 历史问题的决议》(节录)	邓力群(16)
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节录)	胡 绳(34)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与党史研究(节录)	龚育之(39)
对“文化大革命”几个问题的认识	郑 惠(65)
关于“继续革命”的几个问题	龚育之(95)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席 宣(113)
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权利”和 毛泽东对它的误解	石仲泉(126)
关于“文化大革命”起因的探讨	席 宣(142)
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误区与“文化大革命” 的发动	林蕴晖(168)
《五·七指示》初探	王禄林(185)
“文化大革命”和平均主义	席 宣(201)
“左”倾理论与对社会主义曲折认识的关系	杜 蒲(223)
当代社会主义改革与中国的“文化	

大革命”(节录)	郑 谦(243)
毛泽东防止和平演变思想的形成(节录)	李 捷(260)
试谈毛泽东对当代国际共运形势的判断	
和“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谭 凝(266)
国际共运对我党的消极影响(节录)	王福如(280)
不能把“文化大革命”产生的原因简单地	
归结于封建主义	柳建辉(289)
“文革”前的几场文艺风波	林默涵(305)
从学术讨论到“文化大革命”	吴冷西(319)
《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	龚育之(330)
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产生前后(节录)	刘志坚(371)
“文化大革命”中的社会性矛盾	印红标(413)
“两个文革说”与“文化大革命”的定性研究	金春明(429)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经济情况分析	李成瑞(447)
十年动乱中经济体制的变动	(470)
七十年代初期我国经济建设的冒进及其调整	阎放鸣(511)
七十年代前期的中国第二次对外引进高潮	陈东林(536)
“文化大革命”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	关海庭(553)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政治体制	郑 谦(573)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军事工作	(594)
“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的经济思想探析	陈东林(609)
从印制“大字本”古籍看毛泽东晚年的思想	
和心态	刘修明(633)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特点及其	
主犯的刑事责任	余叔通 何秉松(661)
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	王年一(673)

一部简明而有深度的史书

- 《文化大革命“简史”》评价 郑 惠 张 化(706)
- 我所知道的“文革”发动内情 李雪峰(710)
- 评《五·一六通知》 谭宗级(730)
- 关于工作组存废问题 穆 欣(753)
- 回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五十天路线错误”
- 从“6·18”事件到“7·29”大会 李雪峰(774)
-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评述 贺 源 张沅生(803)
- 红卫兵运动述评 印红标(831)
- “文革”初期三个回合的斗争 苏采青(875)
- 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王年一(916)
- 从清华大学两派看“文化大革命”中群众
- 组织的对立和分歧 唐少杰(935)
- 对上海“一月革命”的几点看法 王年一(953)
- 正义的抗争——所谓“二月逆流”的前前后后 ... 曾 涛(969)
- 试析“三支两军”的实践活动及其客观作用 赵国勤(989)
- 刘少奇的悲剧与悲剧中的刘少奇 张 化(1002)
- “刘少奇专案组”始末 黄 峥(1021)
- “革命委员会”始末 关海庭(1040)
-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原因及评价 (1057)
- 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缘起和结果 李丹慧(1077)
- 九大评述 金春明(1105)
- 略论党的九大后的整党 金春明(1117)
- “斗、批、改”运动与一种社会主义模式 郑 谦(1135)
- 1969年前后党对外交战略的重大调整 张保军(1162)
- 九大至九届二中全会前夕毛泽东与林彪的

分歧和矛盾	刘志男(1180)
关于林彪的“第一号令”	苏采青(1202)
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	吴 德(1212)
毛主席在粉碎林彪反革命政变阴谋的日子里 ...	汪东兴(1249)
“九·一三”后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	
思潮的斗争	安建设(1279)
十大评述	谭宗级(1301)
“批林批孔”运动	王海光(1317)
围绕“风庆轮问题”的一场斗争	苏采青(1341)
“组阁”之争	力 平(1372)
邓小平与 1975 年的全面整顿	张沱生(1384)
当代中国文艺史上特殊的一页	
——1975 年文艺调整述论	夏杏珍(1403)
1975 年整顿中的三个著名文件	程中原(1426)
共和国历史性转折的发端	
——从全面整顿走向十一届三中全会	张 化(1451)
四五运动述评	金春明(1471)
“四人帮”覆灭记	范 硕(1497)
后 记	
	(1523)

七十年代初期我国经济建设的 冒进及其调整

阎 放 鸣

70 年代初期，我国经济建设继 1958 年“大跃进”之后，发生了一次新的冒进，给国民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恶果。1971 年九一三事件之后，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开始对国民经济再一次进行调整。经过艰苦的努力，到 1972 年下半年，冒进之风基本得到控制。到 1973 年，调整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是，在“左”的指导思想占居统治地位、“四人帮”不断进行干扰破坏的情况下，调整工作在 1973 年底被迫中断，国民经济再度陷入混乱状态。

—

当进入到 60 年代中期时，我国国民经济在经历了长达近 5 年的调整之后，各项比例关系基本理顺，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基本平衡，产业结构趋向合理，工农业生产稳步增

长，基本建设规模逐年上升。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打乱了经济发展的进程，特别是在1967、1968两年中，我国社会出现了“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极度混乱局面，国民经济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工农业生产在这两年中分别下降了9.6%和4.2%。

进入1969年以后，混乱局面逐渐趋于好转，生产开始了较快地回升。1969年工业总产值和农业总产值达到1853亿元和642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34.2%和1.1%，大部分工农业产品产量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其中一些产品的增长幅度较大。如钢产量比上年增长33.5%，原煤增长33%，发电量增长23.3%，但是，1969年经济的增长带有明显的恢复性质，其所达到的程度也只大体相当于1966年的水平。前两年严重的社会动乱使得生产遭受极大破坏，资金大量浪费，削弱了国家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能力，特别是物质供应、超产运输还远不能满足当时生产的需要。另外，产品质量低劣，经济效益低下，个别产品的产量甚至还在继续下降。由于“左”的错误仍在继续，各级领导权有不少被靠“文化大革命”起家的人和打、砸、抢分子把持，动乱并没有、也不可能消除，个别地方的武斗不仅没有停止，甚至有所扩大。企业大部分的规章制度被废除，大量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还在“靠边站”。就全国来说，尚没有正常的生产秩序可言。

显然，1969 年政治形势的相对稳定和经济恢复的程度是极为有限的，经济建设面临的迫切任务是治理环境，继续恢复。但是，在特定的条件下，党中央对形势作了不切实际的估计，错误地将国民经济在 1969 年恢复性的好转看成是“文化大革命”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的例证，认为“1969 年全国各条战线出现了一片蓬蓬勃勃的崭新局面”，革命和生产形势“一片大好”、“越来越好”，“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新高潮正在到来”。这种对形势的错误分析，导致急于求成的经济建设指导思想再一次占据了主导地位。

形势变化给经济建设指导思想造成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是，1969 年 3 月，中苏边境发生了珍宝岛事件，中苏两党、两国自 50 年代后期逐渐恶化的关系终于发展成为边界军事冲突。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与“帝、修、反”争时间，抢速度，加强国防实力，适应备战的要求，党中央进一步强调了 1964 年提出的把国防建设放在整个经济建设首位的建设方针，要求加速发展大、小三线的建设步伐，大力发展军工生产，因而也相应提高了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的要求。

在这种经济建设思想的指导下，1970 年 2 月到 3 月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讨论拟定了《1970 年和第四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草案）》（以下简称“草案”），突出强调所谓“新的跃进”，强调备战，经济建设中“左”的指导思想和方针进一步得到具体化。

首先，“草案”认为，1970年和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期是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布局、迅速壮大国防力量和建设实力的关键时期，全国人民要以“临战的姿态，跃进的步伐，跨进20世纪70年代”。在“四五”期间，初步建成我国独立的、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此，“草案”规定，到1975年，工业总产值要达到3800—4000亿元，粮食产量6000~6500亿斤，钢产量3500~4000万吨。按照这一计划，5年内工业总产值将平均每年增长14%左右，粮食产量平均增长5.5%左右，钢产量平均增长16%左右。这种经济发展的高速度，不要说在动乱时期，即使是在正常情况下，也是难以达到的。

其次，“草案”强调“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以备战作为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要求尽快改变工业布局，集中建设大三线地区，到1972年“基本建成一个具有比较强大的重工业和能够初步可以自给的农业的战略后方”，到1975年“建成一个部门比较齐全、各有特点，工业和农业协调发展的强大战略后方”。同时，为适应备战的需要，“草案”强调发展“小而全”的经济体系，把全国划分为西南、西北、中原、华南、华东、华北、

按照“草案”当时的划分，大三线包括：云、贵、川、陕、甘、青（大部）、晋（大部）、豫西、鄂西、湘西、桂西北、冀西等地区。

东北、山东、闽赣、新疆 10 个经济协作区，并要求“尽快建立各有特点、不同水平、工业和农业协调发展的经济体系，做到各自为战，大力协同”。另外，工业布局本着“大分散、小集中，又搞大城市”的原则，大力发展地方工业，发展小钢铁、小煤窑、小水泥、小水电、小化肥等，实现地区经济的自给自足。

在盲目追求高指标、高速度的自成体系的同时，“草案”还提出了全面下放经济管理权限的方案。其中主要内容是：第一、各部直属企业绝大部分下放给地方管理；第二、物资管理体制实行地区平衡，差额调拨，品种调剂，保证上缴的办法；第三、基本建设实行分级管理，大多数项目由地方统筹安排；第四、财政管理体制实行定收定支，总额分成的办法；第五、计划编制先由下而上，后由上而下，加强地区综合平衡。

早在 60 年代国民经济调整后期，随着经济形势的逐步好转，各地要求中央下放经济管理权限的呼声便逐渐高涨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在 1966 年提出要搞“虚君共和”，强调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要求把调整时期各部上收的大中型企业重新下放给地方。但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动乱，除企业折旧基金等小部分管理权限下放给地方和企业外，其他措施未来得及出台。1969 年，在大批所谓“条条专政”、“管、卡、压”的情况下，中央开始大规模地

下放经济管理权限。对此，“草案”将各项措施系统化。

对形势的错误估计，指导思想、建设方针和计划安排上的失误，加上社会动乱和管理权限下放过急、过猛而产生的宏观调节失控，使经济建设中的冒进之风又一次高涨起来。1970年3月，在纪念《鞍钢宪法》发表10周年之际，鞍钢率先在全国提出了5年内钢产量翻一番的口号。这一口号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并迅速在全国得到响应。许多部门和地区不顾条件的可能，随之纷纷提出“翻番”、“跃进”的口号。煤炭行业提出：“大干三年，扭转北煤南运”，力争1975年煤炭产量跃居世界第一；冶金行业提出：到1975年要在各经济协作区建成完整的、不同水平和各有特点的钢铁工业体系；电力行业提出：到1972年要实现“发电量翻一番，全国县县都有电”的目标，到1975年，发电能力要超过英、德；国防行业提出：在尖端科研上，“四五”计划的前三年赶上美苏，后两年超过美苏；轻工行业提出：1975年轻工产值要达到1300亿元（比1969年增长55%），主要轻工产品产量翻一番。各地区也纷纷把建立各自独立的经济体系作为奋斗目标，大区要自给，省要自给，甚至连县也提出要建立“小而全”的经济体系。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各行各业掀起了会战浪潮，全国的基建规模迅速膨胀，国家基建计划一再被突破，地方自筹投资在总投资中所占比重也越来越大，一场新的经济冒进就这

样从 1970 年初开始，迅速在全国展开。

由于经济建设出现了一拥而上、齐头并进的冒进，在全国范围内很快就出现了供求比例关系严重不平衡的问题，并开始引起了党中央和毛泽东本人的重视。鉴于 1958 年“大跃进”的严重教训，1970 年 11 月，毛泽东告诫人们：现在倒要警惕，要防止有些人动不动就要翻一番，一点是材料不够，一点是设备投资跟不上。全国紧张。周恩来当时也多次讲到，“每计划一件事，要想到留有余地”，“在突飞猛进时，要防止不顾一切的倾向”，强调要搞好综合平衡，“县要平衡，地区要平衡，大区要平衡，全国要平衡”。

根据这些讲话精神，1971 年的国家计划中提出：在生产建设中，既要反对右倾保守思想，又要防止不顾客观条件，什么都要大办；既要注意数量，又要强调品种、质量，注意经济核算，讲求实效；既要高速度，又要按比例；既要解放思想，又尊重科学。计划同时还强调要控制基本建设规模，控制职工人数的增长，加强对农业的支援。

但是，这些正确的思想和方针并没有在实际工作中得到贯彻落实。由于“左”的指导思想仍占统治地位，1971 年的国民经济计划继续追求“四五”计划纲要中规定的高指标，同时还盲目地提出要把在当年实现钢产量突破 2000 万吨的设想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在经济建设“以钢为纲”的情况下，钢产量指标的高低，对整个计划的影响是相

当大的。另外，随着 1969 年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地方权限迅速扩大，各地都把建立各自“小而全”的经济体系作为长期的奋斗目标，而不愿在这一努力开始不久便放弃原定的计划。同时，由于管理权限下放，中央的宏观调控手段非常软弱。在这种情况下，计划外自筹资金的建设规模继续扩大。另一方面，以备战为中心的经济建设方针在 1971 年尚未扭转过来，用于大三线和军工项目的投资比重居高不下。由于以上这些主要原因，1971 年的基建规模不仅没有压缩，反而进一步扩大，经济建设的冒进之风有增无减。

二

70 年代初期的经济冒进与 1958 年的“大跃进”具有一个共同的主要特征，就是在经济处于扩张时期，削弱了宏观调控能力，大上基建项目，使整个基建规模超过了社会资本资源的供给能力，导致各项经济比例关系的严重失调，其后果是十分严重的。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农轻重比例失调

为了加强国防工业，建立各地区独立的经济体系，70 年代初期以钢铁为中心，重工业的投资比重迅速扩大，农轻重比例严重失调。以 1971 年为例，农业投资仅占投资总额 10%，而工业投资比重高达 65.2%，农业投资比重之低和

工业投资比重之高都超过三年“大跃进”时期。在为数不多的农业投资中，还有相当大的资金被用于发展地方加工工业。如安徽省临泉县农机厂，由于1970年承担了省里搞的机床会战、铁道会战等任务，使这个拥有88名工人、32部机床的工厂，只有33名工人和10部机床从事农机修造任务，水泵和打井锅锥的生产计划只完成了2.1%和3.3%。又如江苏省常熟县，1970年国家分配农用钢材100吨，但真正用于农业的只有50%。还有一些地方和企业，虽然想发展农业，但却得不到资金和物资，不得不转产。例如，湖北省新洲县城关镇的农具厂原生产支农产品，进入1970年后，上级既不拨资金，也不拨设备。后转产牛头刨，省地共拨资金45万元，新添设备22台，工人也由原来的83人增加到207人。由于大量的农机修造厂转产，大量的农用机械得不到维护和保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全国农用拖拉机存在着“三三制”的现象，即：正常运行的占1/3；带病运行的占1/3；“爬窝”的占1/3。

农业投资比例的下降以及农业劳动力的锐减，使农业发展受到严重影响，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下降，生产发展的速度大大落后于人口和工业增长的速度。1972年，全国大约有6亿亩农田受灾，粮食产量比上年减少200亿斤，加剧了全国范围的粮食供应紧张。素有“天府之国”之称的四川省，1970年的粮食产量为460亿斤，仅大体相当于1957年

的水平，而这一年全省的人口却比 1957 年增加了 1000 多万。1971 年和 1972 年，全国棉花产量连续下降，迫使国家在市场棉布供应十分紧张的情况下，连续 3 年将棉纱生产计划停留在 1000 万件的水平上。

在工业投资中，轻工业的投资比重也明显下降。1971 年，轻工业投资仅占工业投资总额的 5.8%，是建国以来，除 1963 年以外，所占工业投资比重最低的一年。当时，在备战的要求下，还有相当一部分轻工企业转产军工产品。由于这些原因，使得市场上许多轻工产品脱销断档，给人民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二）基建规模过大，积累与消费比例失调

为了实现国民经济的“新跃进”，1970 年全国基本建设规模迅速膨胀，基建投资总额由上年的 $\times \times \times$ 亿元，猛增到 $\times \times \times$ 亿元，增长幅度继 1958 年之后，再一次突破了三位数。在此基础上，1971 年又继续增加到 $\times \times \times$ 亿元。1970 年在建的大中型项目达 $\times \times \times \times$ 个，超过计划 $\times \times \times$ 个；1971 年又进一步增加到 $\times \times \times \times$ 个，超过计划 $\times \times \times$ 个。

基建战线过长，首先扩大了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矛盾，使资金和物资供应出现了较大的“缺口”。拿 1970 年建筑用的三材供需情况来看，仅据物资部门年初匡算，当年全国基本建设实际共需钢材 316 万吨，而计划分配只能达到 242 万吨，“缺口”达 23%；实际需要木材 746 万立方米，

计划分配只有 595 立方米，“缺口”达 24%；实际需水泥 1000 万吨，计划分配只有 770 万吨，“缺口”达 23%。基建规模过大，还导致投资效益的下降。1971 年全国建成投产的大中型项目不到计划数的 $\frac{1}{3}$ ，39 种主要产品新增生产能力的计划，有 36 种没有完成。另外，许多基建项目仓促上马，造成了资源的巨大浪费。例如，从 1970 年到 1972 年，陕西延安地区为建立“小而全”的经济体系，结束陕北“手无寸铁”的局面，耗资 2000 多万元，建了一家钢厂、两座铁矿和三个铁厂。但由于当地资源有限，品位又低，交通也极不便利，结果从 1972 年到 1978 年，共亏损了 3700 多万元，超过了建厂投资，1979 年不得不关闭了铁厂和铁矿，钢厂也停产整顿。

基建规模过大，提高了国民收入使用额中用于积累的部分。1970 年到 1972 年，3 年积累率平均达 33%，大大超过了“一五”计划时期 24.2% 的比例。在国民收入本身增长速度降低的情况下，这样大幅度提高积累率，势必挤了消费。从积累内部的结构来看，与人民生活直接相关的非生产性积累比重在这几年中也有所下降。“一五”计划时期，非生产性积累占全部积累额的 40%，而 1970 年到 1972 年的 3 年中，平均下降为 24.4%。反映在实际经济工作中，城市建设停滞不前，公用设施严重不足，文教卫生事业举步维艰；生活中的“几大难”问题在全国普遍存在。以辽宁